

宋代湖南學研究

[日]高畑常信 著

田訪 等 譯



人民出版社

宋代湖南學研究

[日]高畑常信 著

田訪 等 譯

策劃編輯：雷坤寧

責任編輯：雷坤寧 翟金明

封面設計：林芝玉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宋代湖南學研究/(日)高畑常信 著;田訪 等 譯. 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9.6
ISBN 978-7-01-019952-8

I. ①宋… II. ①高… ②田… III. ①理學—研究—中國—宋代 IV. ①B244.0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239208 號

北京市出版境外圖書合同登記號:01-2018-5851

宋代湖南學研究

SONGDAI HUNANXUE YANJIU

[日]高畑常信 著 田訪 等 譯

人民出版社 出版發行

(100706 北京市東城區隆福寺街 99 號)

山東鴻君傑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

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開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張:20.25 插頁:2

字數:290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9952-8 定價:68.00 元

郵購地址 100706 北京市東城區隆福寺街 99 號

人民東方圖書銷售中心 電話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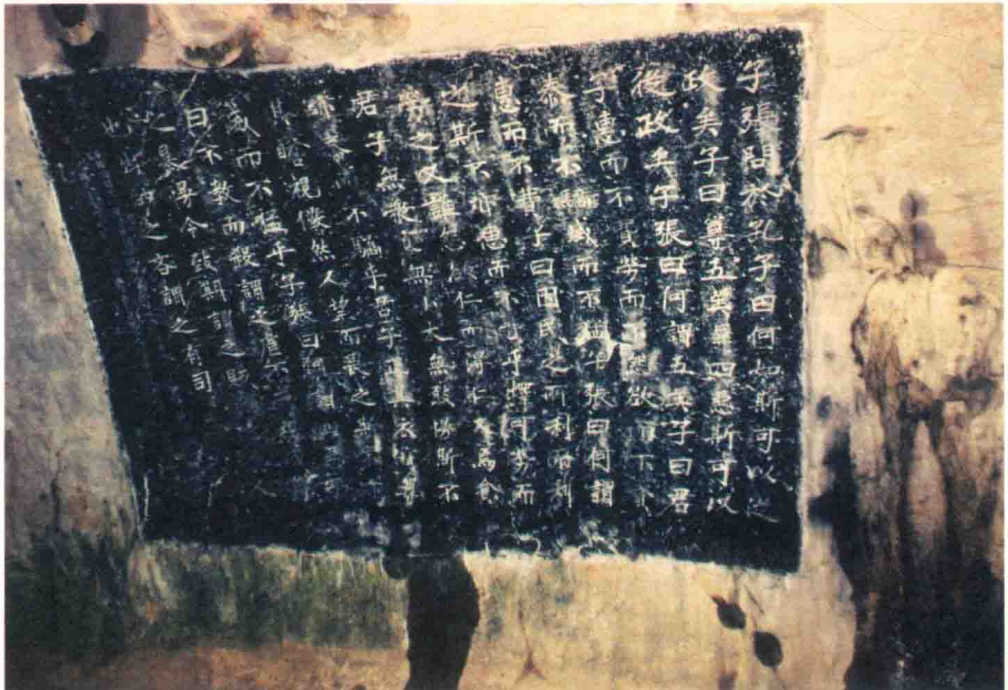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·侵權必究

凡購買本社圖書,如有印製質量問題,我社負責調換。

服務電話:(010)65250042



張南軒之墓(湖南省寧鄉縣馮山)



桂林彈子巖張南軒書《論語·堯曰·問政章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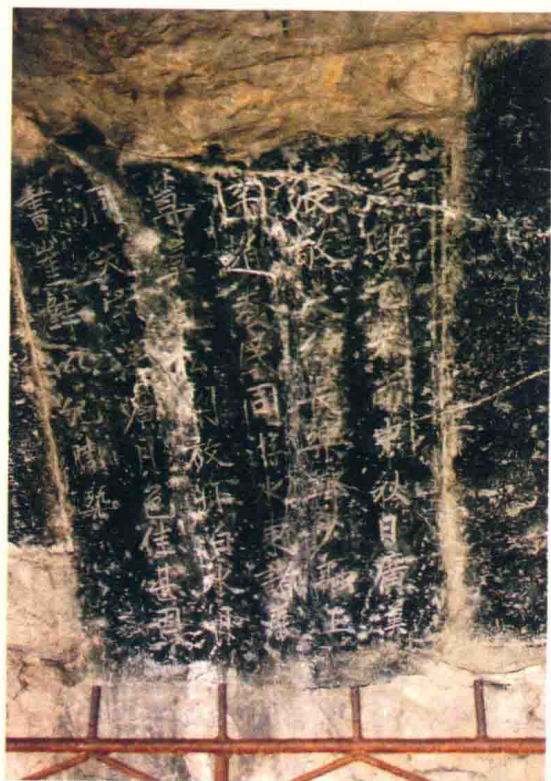
桂林隱山北牖洞張南軒“招隱”題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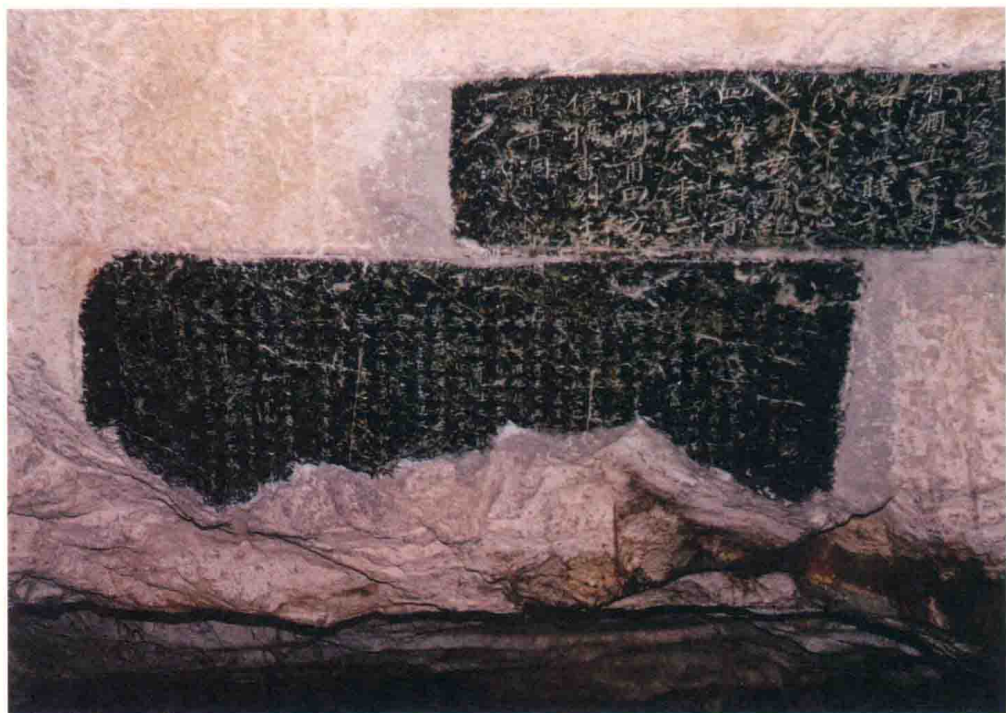
同上



桂林曾公巖張南軒“曾公巖”題名



桂林舜山張南軒《韶音洞記》



桂林水月洞張南軒《水月洞題名》



武夷山武夷宮《劉子羽神道碑》，朱子撰文、張南軒篆額

中文版凡例

1. 本書是高畑常信《宋代湖南學の研究》(秋山書店,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)的全文翻譯;包括主體和附錄兩部分,但刪除了原著中的照片和圖錄。附錄部分依照原著收錄了作者的幾篇論文和譯注。

2. 正文中的日文著作、論文標題均翻譯為中文,另以譯者注的形式標明該著作、論文的日文原文。參考文獻中的著作、論文均以中文標示。

3. 對原著中的一些標點、文字輸入等錯誤做了統一更正,不一一出注說明。

4. 原著中的日文標點統一改為中文標點:『』改為《》,「」改為“ ”或者《》。

序

《宋代湖南學研究》是日本著名學者高畑常信撰寫的一本全面介紹湖南學的著述。這是一個外國學者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注和闡述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。為此，我和張筱林先生委託鄧洪波教授、田訪博士等組織力量進行了翻譯，力圖全面介紹高畑常信教授的著述，使學界瞭解他的獨到見解。這對弘揚湖南學，特別是南軒學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。高畑常信教授的精闢論述，仿佛讓我們回到了九百年前中華思想文化鼎盛時期的南宋，聆聽了先賢胡安國、胡宏的教誨。特別是南軒張子和晦翁朱子這兩位哲學巨人、集大成者之間真實的學術對話和交流，讓我們享受了一場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洗禮，引發我們對宋代以來中國文化發展的思索。我相信，本書的翻譯和出版，必將對當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產生積極影響，也將對世界思想文化的探索做出重要貢獻。

在南宋時期，中國出現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第二次思想文化的高峰，產生了以張南軒為代表的湖南學，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，以呂祖謙為代表的浙學，以陸象山為代表的陸學。他們分別主持嶽麓書院、白鹿洞書院、麗澤書院、象山書院，掀起了道學研究的熱潮，使道學大名于天下，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文化。南軒先生由於其特殊的出身（中興名相、抗金統帥張浚長子），聞道甚早，參謀北伐，經筵講學，創立城南書院，主教嶽麓書院，集眾家之長，拉開了中國書院運動的序幕，成為天下共仰的道學宗主和百世之師。南軒先生主政廣南西路和荆湖北路，傳道于二江（靜江和江陵），政績卓著，政通人和，成為士之準的，唯世之模。

南軒先生毅然以斯文為己任，負四海重名，起千載絕學，以堯舜君民之心，

振一世沉溺；以孔孟性理之學，起一世膏肓。人宗其學，家藏其書，君信其言，民孚其惠。由於積勞成疾，淳熙七年二月初二，南軒先生病逝於江陵府舍，享年四十八歲。南軒先生愛君憂國，至公血誠，在病亟將死之際還給宋孝宗上奏摺，猶勸君王以“親君子，遠小人，信任防一己之偏，好惡公天下之理，以清四海，克固丕圖”。史書記載，他去世後“柩出江陵，老稚挽車號慟，數十里不絕。訃聞，上亦深爲嗟悼。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，而靜江（今廣西桂林）之人哭之尤哀”。就是說老人和小孩扶著靈車痛哭，數十里相送，可見他深得廣大民衆的愛戴。

南軒先生有武侯王佐之才、“公輔之望”，在南宋的學界、軍界、政壇和民間具有極其崇高的威望和極大的影響。南宋著名學者、歷史學家，岳飛的孫子岳珂十分敬重南軒先生，他在《張宣公書簡帖贊》中稱南軒先生“淳熙之間，天下爲公”，意思是說淳熙之間，因爲有了南軒先生，天下才得到了較好的治理；“公於是時，不下禹功”，就是說南軒先生的功勞與大禹一樣偉大，並認爲南軒先生“學冠穹壤，名儕岱嵩，萬世仰之，曰人中龍”。

宋朝末年的著名學者方回在《南軒集鈔序》中認爲南軒先生是一代道學宗主，並分析了南軒先生能成爲道學宗主的主要原因。方回云：“是故能以其身方駕並驅於千古之上，爲一世道學宗主，夫豈偶然也哉？然則道之準在乎仁，學之準在乎敬。敬則仁，仁則道，此不可易之要也。而其所以漸磨視效者，猶有人焉。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爲之父，以胡文定五峰爲之師，以晦菴、東萊爲之友，而又取法諸古人。其修身也，期以顏子爲準的，著《希顏錄》；其治也，欲以孔明爲準的，著《諸葛忠武侯傳》。”

南宋另一著名學者韓泂則認爲：“張敬夫（即張栻的字）卓然有高明處，雖未十分成就，而拳拳尊德樂道之意，絕出諸賢之上。呂伯恭拳拳家國，有溫柔敦厚之考教。朱元晦強辯，自立處亦有膽略。蓋張之識見，呂之議論，朱之編集，各具所長。”

南軒先生的好友、詩壇領袖楊萬里，十分推重南軒先生在學術上的造詣：“聖域有疆，南軒拓之；聖門有鑰，南軒擴之；聖田有秋，南軒獲之。”

宋末抗元名將杜杲在《重修建康張栻祠堂記》中認爲：“南軒先生張氏，文公所敬。二先生相與發明，以續周程之學，於是道學之盛，如日之升，如江海之

沛。婦人孺子聞先生之名者，皆知其爲賢”；“南軒之名，與道俱尊”。

宋寧宗時，給南軒先生定謚號爲“宣”，並在下聖旨時認爲“聖賢不傳之緒，賴公復續”；“經曰：天不愛其道。董仲舒曰：道之大原出於天。道固天之道，天不輕以授人，自周公、孔子以至孟子，厥後罕傳，雖間有經生文士，性理是談，體用未明，或相矛盾。宋興百年，濂溪二程發明于前，呂謝游楊扶持于後。義理貫徹，復出前儒。公與晦庵朱氏，出而嗣之，相爲師友，于是演迤溥博，丕闡于世。得其大者，足以名當世；得其小者，亦足善一身。考論淵源所自，公力居多”。也就是說，朝廷認爲南軒先生是獲得“天之道”的偉大思想家；並認可南軒先生和朱熹在“道”傳播方面的巨大貢獻；同時，認爲南軒先生的貢獻比朱熹要大。

南宋後期著名理學領袖真德秀認爲南軒張子和朱子集諸老之大成，是學派的旗幟。其在《潭州勸學文》中云：“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，未有出湖湘之右者。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，生於舂陵，以其心悟獨得之學，著爲《通書》《太極圖》，昭示來世，上承孔孟之學，下啓河洛之傳。中則有胡文定公，以所聞于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，其所爲《春秋傳》，專以息邪說，距詖行、扶皇極、正人心爲本。熙寧以後，此學廢絕，公書一出，大義復明。其子致堂、五峰二先生，又以得於家庭者，進則施諸用，退則淑其徒，所著《論語詳說》《讀史》《知言》等書，皆有益於後學。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於茲土，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。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於一，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，又皆集諸老之大成，理義之秘，至是無復餘蘊。此邦之士，登牆承謦者甚衆，故人才輩出，有非他郡國所可及。今二先生雖遠，所著之書具存，皆學者所當加意。而南軒之論孟說，晦庵之大學中庸章句、或問、論孟集注，則于學者爲尤切，譬之菽粟布帛，不容以一日去者也。”

就連朱子師說地位的主要維護者，朱子的門生、朱學後學的代表人物黃震在論朱、張二人的地位和關係時也不得不說：“南軒先生講學專主涵養持敬，謀國專主致君仇敵，居官專主恤民練軍。乾、淳諸儒議論，與晦翁相表裏者，先生（指張栻）一人而已。晦翁之言，精到開拓，足集諸儒之大成；先生之文，和平含蓄，庶幾程氏之遺風。晦翁精究聖賢之傳，排辟異說，所力任者，在萬世之道統；先生將命君父之間，誓言誅濫敵，所力任者，在萬世之綱常。元氣胥會，

二儒並出，其更相切磨，友誼卓然，又促使千載興起。嗚呼，此其所以爲乾、淳之盛歟！”

南軒先生的好友晦翁朱子本人十分推崇南軒先生，從南軒游，承南軒之志，在其撰寫的祭文中云：“惟公家傳忠孝，學造精微，外爲軍民所屬望，內爲學者所依歸，治民以寬，事君以敬，正大光明，表裏輝映。自我觀之，非惟十駕之弗及。”

清代著名史學家、文學家，浙東學派重要代表全祖望則云：“宣公身後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、岷隱遊者。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，吳文定公之勳名，二游、文清、莊簡公之德器，以至胡盤谷輩，嶽麓之鉅子也。再傳而得漫塘（劉宰）、實齋（王遂），誰謂張氏之學弱于朱子乎？”《宋元學案》認爲：“張門弟子多有蹈仁義而死者，少有求生而害仁義者。宋末抗元之役，衡麓諸生，荷戈登陴，以血正義，亡之十九，昭著青史。”

宋末以來，由於權相史彌遠（史彌遠之父史浩主和，南軒之父張浚主戰，政見不同）、朱元璋（朱元璋和朱熹爲本家，爲加強統治需要，欲追認朱熹爲先祖，將朱子學定爲一尊）、順治和康熙皇帝（清爲女真後裔所建，張浚、張栻是南宋抗金領袖人物，清初滿漢矛盾激烈，順治、康熙爲加強統治，一方面清承明制，繼續抬高朱子地位；另一方面打壓抗清人士，包括張浚、張栻爲代表的漢民族英雄，順治年間，鄭成功等組織抗清，清王朝將張浚配享帝王廟的資格罷黜就是明顯例證）等種種原因，道學（理學）逐漸成爲官學，朱子地位逐漸提高，在明清時期定爲一尊。而南軒先生儘管在道學崛起過程中具有核心和領袖地位，其學術思想在明清時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應有的地位。但南軒思想在宋、元、明、清王朝還是有重要影響並配享孔廟，仍在湖南、四川、江蘇、浙江、廣西、江西、廣東、福建、湖北等地受到推崇，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宋度宗時期，在建康敕建南軒書院；元仁宗時期，在四川綿竹敕建紫岩書院，祭祀南軒父子；明世宗時期，在湖南寧鄉敕建南軒書院，命南軒父子墓地爲官山；清乾隆皇帝御書“道南正脈”匾額送南軒先生講學的嶽麓書院和城南書院，還收藏了南軒先生的硯臺，並題詩“南軒曾是友龍賓，師是胡宏授受真。治郡立朝多實踐，空言道學豈其人”；清道光皇帝御書“麗澤風長”匾額送城南書院；清同治皇帝下聖旨在南軒父子墓前建下馬碑，“大小文武官員，至此止步下車”。

特別是近代以來，湖南出現了以陶澍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譚嗣同、黃興、毛澤東等爲代表的五批傑出人才群，“中興將相十九湖湘”；“大江東去，無非湘水餘波”；“惟楚有材，三湘弟子遍天下；於世無偶，百代弦歌貫古今”。湖湘子弟在中國大地上力挽狂瀾，掀起了一撥又一撥的時代狂潮。這些傑出人才群，皆出自南軒先生創立的城南書院或其主教的嶽麓書院，深受南軒先生思想的教化和精神的鼓勵。可以說，張南軒先生是近代湖湘傑出人才群的啓蒙老師和精神導師，展現了南軒學救國救民的突出作用和傳道濟民的精神內涵。

在南軒先生的故鄉，南軒之學在蜀中廣爲傳授，推動了南宋時期四川地區蜀學再盛的局面。《宋元學案》說：“宣公（張栻）居長沙之二水，而蜀中反疏。然自宇文挺臣（紹節）、范文叔（仲黼）、陳平甫（概）傳之入蜀，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。……蜀學之盛，終出於宣公之緒”。清朝時，維新變法六君子之一的楊銳十分敬仰張南軒，曾作詩歌頌張南軒：“高天仰北斗，正學崇南軒”，對張南軒的敬仰之情溢於言表。

道學即是理學，在元、明、清時成爲國家主流思想文化，促進了民族融合與和解；理學傳播到日本、朝鮮、越南等國，並產生了重要影響。明朝時，東學西漸，理學傳播到歐洲，對伏爾泰等思想家產生重要影響，促進了歐洲的文藝復興。然而，清朝後期，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，西方在技術上超越東方，西方列強用武力侵略中國，西學東漸，中華民族面臨亡國亡種的危機，包括理學在內的東方傳統文化受到很大衝擊，出現了自有文明以來從未有過的道德危機、人倫秩序混亂、文化自信缺乏的混亂局面，有識之士無不感到痛心疾首，呼喚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。

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。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，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我們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的夢想。中華民族歷經磨難，五千年文明一直延續，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中唯一沒有中斷文明的國家。民族復興的前提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。中央電視臺開闢的“百家講壇”欄目，在中國掀起了學習傳統文化的熱潮，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成爲有識之士的共識。近年來，湖南學者積極推動，仿照南軒張子和朱子在嶽麓書院會講的形式，多次舉辦自由講學活動。通過電視臺等媒體的傳播，引起了國家級媒體的高度重視，2017年1月，國家適應傳統文化復興

的需要，下發了《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》，這對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。

如果說張子和朱子適應了儒、釋、道三教合流的形勢，積極宣導，相與發明，使道學大名於天下，實現了中國第一次文化復興；那麼當代中國，則亟需第二次文化復興。文化復興當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，以南軒先生為楷模，建設中國人的精神家園，實現文化自信。我們要學習南軒先生匡扶社稷、鞠躬盡瘁、死而後已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和高尚人格；學習南軒先生成就人才，傳道濟民的教育思想，扭轉學風不正的局面；學習南軒先生重教化、明人倫的思想，恢復中國的人倫秩序；學習南軒先生經世致用、治民以寬、勤政為民的良好作風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天下大同而努力！

天地之道不息，則張朱之教不朽！

是為序。

嶽麓書院張南軒思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

張勁松

2017年9月10日於北京

自序

當我們回顧最近的中國宋代思想研究及其相關領域，思考它是由怎樣的問題意識展開的時候，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。第一，補充和擴展了受到清代考證學影響的基礎研究。這體現在資料的整理和考證等版本比較研究、翻譯，以及索引的編纂等幾個方面。第二，將沒有充分體系化的中國思想（朱子學）體系化，再加以深入理解；其中有些學者借用了康德等西方哲學、西田幾多郎哲學的理論，並試圖在此體系中梳理、理解朱子的思想。第三，由於受到中國革命的影響，將中國思想區分為唯物論和唯心論來進行考察。這種區分也被應用於宋代思想研究，而深受中國革命影響的學者支持唯物論，否定唯心論。同時，也有學者從是進步還是保守的立場進行考察，很多情況下將儒教、朱子學當作保守的權威主義而予以否定。第四，對朱子學與陽明學的關係的理解，既有人認為陽明學是一種對朱子學的反動，也有人認為陽明學是一種對朱子學的發展。也就是說，朱子學與陽明學的關係，要麼是否定割裂，要麼是發展繼承。

就宋代的思想來看，特別是在南宋，有①朱子之學（考亭學派）、②湖南學、③陸學、④浙學之分。在元、明、清三代，朱子學具有權威，因而朱子的思想被廣泛研究，而其他學派的相關學者幾乎無人問津。換言之，由於朱子對這些學派的否定、攻擊，特別是認定他們為“學說錯誤”，使得這些學派及相關學者的思想被貼上“已解決”的標籤，而被忽略了。為了突顯朱子學的特徵，當今學者多採取與朱子相同的立場，全盤接受朱子對其他學派的否定。也就是說，站在湖南學、陸學、浙學的立場來考察朱子學的研究很少。

如果以上理解是正確的，那麼在從湖南學、陸學、浙學的立場來考察朱子

學的研究當中,吉田公平的《陸象山與王陽明》(研文出版,1990)是從陸象山的角度考察朱子的著述,庄司莊一的《中國哲學史文學逍遙》(角川書店,1994)是從浙學的角度考察朱子的著述^①,本書則是率先從湖南學的立場來考察朱子的著述。

接著,我要談及以下重要的研究著作。

後藤俊瑞(1893年3月10日—1961年7月31日,六十八歲卒。廣島大學文學部教授)的《朱子的實踐哲學》(目黑書店,1937)、《朱子的倫理思想》(後藤俊瑞博士遺稿刊行會,1964),是參考康德哲學總結而成的著述^②。此外,還有《四書集注索引》《四書或問索引》《詩集傳事類索引》等基礎研究。

友枝龍太郎(1916—1986年1月8日,七十歲卒。廣島大學文學部教授,西南學院大學教授)是筆者的指導教授,筆者從《朱子思想的形成》(春秋社,1969)一書受益頗多^③;《朱子思想的形成》將朱子從出生到逝世的一生都納入其研究範疇。該書論述道,“最近的朱子學研究,主要致力於將朱子的思想打造成一個有體系的東西”(《朱子思想的形成·序論》之“研究方針”,4頁),這是對後藤俊瑞《朱子的實踐哲學》《朱子的倫理思想》等的批判。但正如友枝龍太郎所指出的,根據年譜考察思想的變遷,這一觀念是該書所欠缺的。

友枝龍太郎又說,“將異時異質的部分進行分解,從時間上來進行評價,使之符合朱子的年齡,從而探求其思維方法是如何展開的”(《序論》之“研究方針”,5頁),他將朱子一生分為四十歲以前和四十歲以後,研究其思想如何變化。在前人的研究當中,已有王懋宏(號白田,1689—1874,七十四歲卒)的《朱子年譜》、夏炘(1789—1871,八十三歲卒)《述朱質疑》(收入《景紫堂全書》)卷三《朱子丁亥(三十八歲)戊子(三十九歲)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考》、卷四《朱子己丑(四十歲)以後,辯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考》等論文。朱子的思想在四十歲以前和四十歲以後有所不同,這是學界的常識。但友枝龍太郎將西田哲學的“直感”對應朱子的“未發”、將西田的“反省”對應朱子的“已

① 譯者注:吉田公平《陸象山と王陽明》,庄司莊一《中国哲史文学逍遙》。

② 譯者注:見後藤俊瑞《朱子の実践哲学》《朱子の論理思想》《四書集注索引》《四書或問索引》《詩集伝事類索引》。

③ 譯者注:友枝龍太郎《朱子の思想形成》。

發”；在加深對朱子的理解的同時，針對朱子學是進步的還是保守的這一問題，他說：“面對夏天的旱災，朱子命令豪家地主救濟貧民，又建配給所，供給米糧，修堤防，作出種麥的指示，盡八方之力以救民衆於困境。此間，更不必說申請諸多減稅政策。這些施政都可以看做是儒教人文主義的表現。”（《朱子思想的形成·序論》，26 頁）由此可知，受當時流行的中國革命的影響，針對是進步還是保守這一問題，他採取的是儒教（朱子學）是進步的這一立場。

再者，他說：“朱子是堅決反對主和論的。他也不贊成勇往直前的主戰論，而是主張一邊增強內政軍政，一邊抗金，是一個持久論者。這在當時正是知己知彼的折衷之策，而侯外廬的《中國思想通史》認為其論近似於主和論，因此是侯氏所不能贊同的。”（《朱子思想的形成·序論》，26 頁）又說：“關於朱子的思想，現在一般認為它是唯心論的、封建的，因此有評論認為它的立場是榨取民衆的，這樣的評價，泉下的朱子能接受嗎？將他拉進現代的法庭，不聽被告的申訴，單方面地做判決，這是何等的簡單。而且，直接套用公式而形成的解釋，不是別的，正是教條主義，其本身就是一種唯心論。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，是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處把握古人，在流動的歷史過程中弄清真相。”（《朱子思想的形成·序論》，28 頁）又說：“推行經界法的目的是為了劫富濟貧。朱子通過實行經界法，試圖切斷官吏與富民之間的勾結，實現國家的公共權力。”（《朱子思想的形成·序論》，32—33 頁）又說：“的確，朱子懷念的恤民、省賦、治民的策略沒能實現，也沒能確立朝廷的綱紀，南宋的衰敗態勢對此已經無能為力。……但是在文化層面統一了大陸的南北，在儒釋道三教的融合之中復活了中國的傳統思想，為到來的時代定立了精神支柱，其文化史上的功績，……正是萬世之宗師。”（《朱子思想的形成·序論》，36 頁）但他對於儒教（朱子學）是進步的還是保守的這一問題，一以貫之地採取了儒教（朱子學）是進步的這一立場。

對此，學者曾經有過書評和駁論。但是，這是距今二十五年以前的論點，今日，在回顧過去，展望將來之時也要提及。不過，書評和駁論是發表當時的東西，它與作者現在如何思考已經沒有關係。

吉田公平（1942 年生。現為廣島大學文學部教授）在書評（《集刊東洋學》二十二號，1969，100 頁）中，稱之為“該書的缺陷……”。後藤延子（現為